

导 论^①

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改革开放向何处去？这是中国公民们都在思索的问题。过去的很长时间内，人们的认识与实践总是在十字路口徘徊着。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与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澄清了姓“资”姓“社”等理论是非。他要求思想更解放，胆子更大，步子更快，抓住机遇再上新台阶。他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扩大改革开放，“其他的路都是死路”，从而坚定了全国人民改革开放的信念，扫除了观念上的重重障碍，为当时徘徊于十字路口上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向纵深大步挺进，进入了新阶段。

^① 本篇导论基本保留了香港版本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但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作为大会的主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承邓小平同志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从而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保证了中国发展前进的正确方向。

2001 年 7 月 1 日，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了震惊中外的纲领性讲话，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八十周年奋斗历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学说，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个讲话的历史意义十分深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尤其是“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是共产党的性质的伟大升华，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巨大贡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决了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历史使命的话，那么“三个代表”学说则解决了共产党在执政时期的历史使命；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的话，那么“三个代表”学说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解决了共产主义的宏伟理想的话，那么“三个代表”则解决了共产主义的现实的、具体的发展战略。其中的深刻含义还有待于更深入的挖掘，有些更深刻的意义以一般思维在较短的时期内还难以透彻理解，随着历史的发展，必将进一步闪耀其夺目的真理光彩，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三个代表”学说的指导

下，一场更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将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必将产生一大批先进的、系统的、具体的社会科学理论，更强有力的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改革开放的更全面更深入地向纵深挺进，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地发展。

一 改革呼唤理论

改革开放绝不仅仅是个实践问题，更重要的是个理论问题。思想僵化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障碍，不改变观念，改革开放就不能变为自觉的行动。尽管大势所趋时，人们都一致表示拥护紧跟，但一有机会，其中就会有不少人跳出来横加指责，一些极左的教条主义者甚至大肆漫骂邓小平理论是现代修正主义，对改革开放横加指责与干扰。如魏巍的《在新世纪的门槛上》一文（《中流》杂志 1999 年第 11 期），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手法，大肆攻击我党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邓小平理论，将改革开放的一切统统斥为修正主义，公然叫嚣寄希望于 21 世纪的人民起来“革命”。尽管这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但毕竟是前进路上的障碍。如果不从本质上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很难说今后可以一帆风顺。因此，邓小平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更新观念，呼唤人们“换脑筋”。

“换脑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是靠权力和权威几次号召就能做到的，必须在理论上重大的系统的突破。事实上，一切事物的发展从来都是有立才有破，而不是先破后立。只有新的理论、新的事物出现之后，旧的理论事物才可能被破除。否则即使破除了一个旧世界，所建立的不一定是本质上的新世界，而只是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新观念、新事物一经出现，旧观念、旧事物就自然处在破除之中，立新才能破旧。因此，“换脑筋”必须建立系统的新的理论架构。

改革的实践过程，本身就是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传统经济模式的失败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从正反两方面对传统理论进行了检验，同时也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新观念的正确性。改革在实践上走在历史的前头，而理论研究却还很不适应改革实践的节奏与步伐。邓小平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构，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指导思想，在这个基本指导思想之下，应该产生一系列系统的具体理论来指导实践。可客观上目前还远远达不到这个要求。应该说，多年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不少重大突破，解决了许多重大课题，但需要解决的问题远远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许多新事物，在经典理论中都是与资本主义画等号的，被批判了一个多世纪，而实践证明是科学的。这就要求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深刻的解释。现在已确定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根本改造。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是经济手段。”从理论深度上把市场经济从姓“资”姓“社”的漩涡中解脱

出来，还其历史面目。但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回答。比如，目前广泛实行股份制，这就涉及到按产权股份分配利润的问题，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了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的论点，从而肯定了按劳与按资分配的地位，确定了产权利润的正式“身份”。那么产权利润是不是对剩余劳动剥削的产物？可以肯定，产权利润并非对剩余劳动的剥削，那么其原理又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说不清楚，那么在顽固的传统观念面前就缺乏说服力。

然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之所以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在“社”与“资”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正因为传统理论给许多重大问题都贴上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标签，把属于客观科学的许多问题，如价值规律、商品、利润、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等都纳入阶级斗争的偏见之中，一概冠以资本主义的头衔，与剥削制度画等号，予以全面批判与抛弃。而我们又习惯于按标签论是非，凡事只看标签是什么，而不看内容本质是什么。当有人提出新的见解时，这种“标签观念”就会条件反射般出现本能的反对。“标签观念”正是改革开放的巨大障碍。这恰恰是因为传统理论还不能从本质上作出深刻有力的回答，因而事实上许多人的认识仍然是似是而非，模糊不清。认为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有人在，改变观念仍然是个艰巨的任务，其关键则在于理论上的系统突破。

解放思想，一方面要求勇于冲破传统理论教条的束缚，从传统理论的历史标签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下，勇敢地实事求是地对传统理论进行分析论证，建立系统的理论新建构。这是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项十

分紧迫的任务。

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前些年理论研究的一个重大弊端，而目前最致命的正是基础理论的薄弱。如果缺乏正确的基础理论的指导，就很难保证应用理论不产生偏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基础理论是个敏感的课题，不敢轻易去碰，因而只有等高层领导提出后才敢打打擦边球。更为可悲的是“宁左勿右”的观念依然被不少宣传、出版部门的人士当作护身符，凡是与经典理论有争议的论点，尽管他们也觉得很合乎实际，很有科学性，是当前改革所必需的，但只要没有大人物肯定，他们就只有拒之门外。

二是缺乏系统的整体攻关，缺乏一个有效的发展和管理的学术机制。传统价值学说的局限性人们早有所知，提出过这样那样的质疑，但因为缺乏系统的整体攻关，事实上无法产生系统的理论突破，即使有所突破也是无关宏旨。目前有两种片面的倾向，一种是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传统理论，试图从传统理论中找到改革开放的依据，用传统理论为现行改革政策来作注释。然而，既然是改革就不可能从传统理论中找到依据，否则就不叫改革。我们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是以其实事求是和发展的观点来看事物，而非照搬其具体经济理论。另一种倾向是只顾搞应用理论，大量吸收引进西方理论，对基础理论不予深探，保留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事实上存在着基础理论的许多空白点，应该说这是一大缺陷，如果不能在理论创新上解决这些缺陷，就会给一些人留下攻击改革开放姓“资”的借口。

二 各种价值学说面临严峻挑战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江泽民同志代表党的领导集体提出的论断是实事求是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的问题，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但问题的实质在哪里，怎样才能系统地发展，目前我们依然存在着思路不够清晰的问题。

劳动价值论一直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学说，但是这个学说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正在面临挑战。应该承认，劳动价值论有其科学的成分，但其严重的缺陷已为多数学者所认识，修正、发展劳动价值论已成为普遍的呼声，并有不少学者为此而付出了巨大努力。

价值学说是经济学的基础。不同的价值学说对价值实体、价值源泉、利润源泉等有不同的解释，进而导致商品交换、价值分配、社会模式的不同原则。因此，价值学说的正确与否，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运行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正

确与否。传统的经济模式及社会制度的设计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推演出来的产物。而数十年的实践表明，其结果是不理想的，在许多问题上与客观规律相悖。改革开放的实践，客观上已经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更新与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在科学技术与思想方法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以直观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成果。尽管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学说，但从思维方法到结论都受到历史的局限，可以说是一个科学课题的历史开端，但还不能说这个课题已经完成。研究表明，劳动价值论没有达到真正揭示价值本质、利润本质的目的，并且由此而推导出的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及剥削原因的揭示，尚未达到本质的突破，因而事实上我们对私有制弊端的认识并不深刻，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看法及对未来社会模式的设计不无偏颇。相反，对许多客观的科学本质作了不应有的批判和抛弃，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劳动价值论之所以受到挑战，首先表现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的忽略。比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劳动，什么是创造等等，这些问题并无科学的定义。就价值而言，价值的本义究竟是什么，至今为止仍无揭示。价值的本义实际是物质或事物对于一定对象的能量需求意义，简言之，就是“供需意义”。有供无需或有需无供都不构成价值。脱离了价值的这一本质含义去大谈所谓价值，就很难保证结论的准确性。劳动价值论提出的价值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这实际上与价值本义毫不相干。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者和继承者均没有关于价值本义的具体概念，之所以提出“价值是劳

动量”，并不是从价值本义出发提出的研究成果，而是从商品交换等量关系出发所作的逻辑推演。

自从小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提出“商品具有使用与交换”两种用途的概念后，人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交换的等量关系即计量标准。由于各种不同的商品无法以统一的物理量来计量，因而一直使人们对交换的等量计量标准深感困惑。后来威廉·配第^①等人发现了劳动产品都经历了一定的人类劳动，并且发现了同一生产条件下劳动时间与产品增长的正比关系，于是宣称找到了等量交换的统一标准，并认为劳动量就是价值量。这一似是而非的发现似乎给人以巨大启示，于是人们长期沿用这一概念。

其实，即使劳动量与产品功能增长相一致，以劳动量作交换标准，那也不过是一种计量尺度。尺度只是一种计量标准或工具，而不是价值本身。

劳动价值论的继承者并未发现劳动量与商品价值本义并无共同之处，但因为在原始劳动条件下，劳动量与产品功能增长确有近似的对应增长关系，同时他们的研究目的是交换的计量标准，于是把劳动量这种借用的价值计量工具当作价值定义沿袭下来了。这中间实际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偷换，将价值尺度偷换成了价值实体，因而劳动价值论陷入了“劳动决定论”的偏见，导致了价值源泉“一元论”的形成。认为只有经历劳动的产品才具有价值，未经劳动的物质只能算

^① 威廉·配第（Petty William）1623—1687，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

是财富而没有价值，造成了财富与价值之间的矛盾。

价值源泉“一元论”的片面性导致了交换与分配原则的片面性。由于价值定义偏离了“供需”本质，以本来不是价值实体的劳动量代替价值实体，因而导致了交换与分配原则的偏颇。因为既然以劳动量作价值实体，那么在逻辑推演上就只能确认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而土地与自然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管理都不是价值源泉，除劳动以外的其他天然要素和生产要素都被排除在价值源泉之外。

然而，劳动价值论又声称，土地及劳动工具和科学技术都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威廉·配第有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话曾被马克思高度称赞。既然承认土地是“财富”的源泉，却又不承认是“价值”源泉，这就是说有的“财富”是没有“价值”的，既然没有“价值”又怎么会成为财富呢？出现了财富与所谓价值的第一个巨大矛盾。

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管理水平的不同，所得财富也是大不相同的。尤其是生产工具发展所导致的活劳动的减少和财富的增多，使相同的活劳动量在不同的生产设备水平下产生财富的巨大悬殊。这就出现了财富与劳动量所充当的所谓价值的第二个巨大矛盾。

上述两种矛盾，劳动价值论者完全清楚。亚当·斯密早就发现“用劳动量作价值量只适应于原始野蛮时代”。马

①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哲学教授。

克思也一再分析因土地肥力不同、矿藏的贫富差异、生产设备的不同、科技投入的不同，在相同活劳动条件下所获使用价值差异很大。但由于将劳动量当作价值实体，因而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思维困境，仍然认为现代化设备生产几千磅棉纱与手工生产一磅棉纱所增加的价值相等。生产力越大，所生产的商品越多，因劳动时间越少而认为价值越小；反之，生产力越低，生产的商品越少，因劳动时间越多而价值越大。

当逻辑推演到最后时，马克思认为：在大工业条件下，劳动时间与劳动产品惊人地不成比例，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之所以他们所设想的高级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消失，货币、商品、市场不复存在，提出实行所谓按需分配，认为共产主义是没有商品、产品没有价值、没有市场的产品生产社会，就是以劳动价值论这个脱离价值本质的逻辑推演所得出的结论。

同时，导致了对剩余价值本质的误解。由于曲解了价值的本质，进而没有完全揭示价值源泉，把财富和价值人为地分裂开了。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即创造财富，但不创造价值，认为劳动工具创造财富但不创造价值，制造了一个“是财富而不具有价值”“创造财富而不创造价值”的逻辑，这样就根本无法找到利润的本质和利润的来源。

实事求是地说，剩余价值学说只是发现了一种简单的原始剥夺方式，是当时的一种政治斗争武器，具有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重要历史意义，但从经济科学的立场来说，并没

有揭示剩余价值即利润的本质和源泉。因此不能说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剥削的真正奥秘，据此提出的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当然也不深刻，其说服力也就有限。

把利润的形成原因归结为剥削的结果，这是立足于以劳动量代替价值实体这一论点上作的逻辑演绎，违背了利润的客观本质。利润与地租的分配中存在剥削，这是肯定的，但并不等于利润与地租是剥削的产物，也不等于没有剥削就不存在地租与利润，也不等于没有利润就没有剥削。剩余价值学说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剥削的原因，出发点是好的。但仅以剩余劳动这种现象来作逻辑的推演，事实上没有达到目的。

私有制社会在利润分配上确实存在着很深的剥削，但分配不公所造成的盈缺现象并不是利润的形成原因。因为即使在整体上没有利润，也仍然可在分配上产生剥削。消灭剥削，实现平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但消灭剥削必须充分揭示剥削的本质与原因，才能找到消灭剥削的科学方案。

地租与利润本身是客观的，只是由于占有土地与生产资料的不公，因而导致了天然价值与利润分配的不公。有产者剥夺了无产者的自然资源主权利益、劳动工具（科技）主权利益和部分劳动利益，剥削形成于对上述三项主权的剥夺而非单一的对劳动的侵占。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对自然资源与生产资料两项主权利益的剥夺。因此，把剥削归结为剩余劳动这一狭小的范围，就不可避免地把剥削根源归结为资本及其生产方式本身，于是把价值、商品、利润、市场、等价交

换都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特定产物，与剥削画等号就成为必然，因而对一些社会本质问题作出了误判。

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崇拜西方经济学。应该承认，西方经济学确实有其科学的地方，尤其具有具体的市场操作意义。但就其价值理论而言，是不是就已经很科学了呢？答案是否定的。自从劳动价值论产生以来，长期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出现了不少批判的、对立的观点，产生了不少其他学派，这些学派应该说都在一定范围内为价值论做出了一定意义的贡献，他们在不反对劳动创造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了其他要素创造价值的观点，也提出了与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的价值定义。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这些论点或多或少地接近了价值本质一步，具有一定的市场操作上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同样也是片面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够从本质上把“价值”一词的含义讲清楚。“价值”究竟是什么，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哲学界，还没有文献能够讲清楚，在没有弄清价值本质的前提下研究价值理论，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就价值源泉来说，这是与劳动价值论争论最激烈的课题，较具有代表性的“三要素论”，即“劳动、资本与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这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国内的许多开明学者都倾向于这种观点，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多要素论”等类似的观点。这无疑比劳动价值论的单纯的体力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要全面得多。

实际上，这个观点源于劳动价值论的开山鼻祖威廉·配第的著名论断，即“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对“价值”的定义错误或者定义不清，劳动价值论把价值定义为“劳动量”，结果就出现了承认一种东西是财富而不具有价值、财富越多价值越少的逻辑。但“三要素论”或“多要素论”虽然比劳动价值论科学得多，但同样由于对价值本质的模糊不清，尽管扩大了价值源泉的范畴，但仍然是不完整和不深刻的。

又比如，自然资源如植被、矿产、生物资源、气象资源、江河湖海及其水产资源、空间资源（如地面空间、电磁空间、太空与太空资源等等），这些都是天然的，不是人类创造的。那么这些资源是不是财富？是不是人类利益的源泉？是不是价值的源泉？是不是成为商品参与了市场交换？完全是！这是一种天然价值，是价值的第一源泉。但正由于不懂得“价值”的真正含义，所以无论劳动价值论还是“三要素论”、“多要素论”，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价值的完整源泉，迄今为止有谁提出过天然价值和天然价值源泉的观点呢？没有。

就创造价值来说，尽管不少学派不承认劳动量的价值实体，但没有任何一个学派不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之一，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够讲清楚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目前，虽然在生产力方面找出了许多的创造价值的要素，把科学技术等诸要素作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力要素的学者越来越多，但生产力创造价值的原理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没有一个学派作出原理上的解释，几乎都是采用生产成本加入的方法来说明创造价值，虽然构建出了不少高雅的数学模型，表面看起来似乎颇有深度，其实几乎没有触及到生产劳动运动过

程的创造原理，创造的本质含义的什么？是怎样创造的？理论上还是糊涂账。尤其是利润的源泉问题，历来争论不休，但没有一个理论能够弄清利润的产生原理，根本原因是原有学派还没有弄清劳动的智能本质，没有弄清智能劳动及智能劳动成果即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可变性原理。

价值理论是尚未成熟的学科，这个结论可能令世界一片哗然。但事实是无情的，最终只能接受这个结论。如果把价值理论比作一座大厦，那么价值理论的学者们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找到进入这座大厦的门，仅仅是在价值大厦的门外徘徊，他们的争论仅仅是门外的争吵。因为在很大意义上说，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海市蜃楼。本书的面世，人们将猛然醒悟。

三 批判地继承 科学地发展

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科学发展完善的必由之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条重要原则。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在不断的批判过程中继承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因此，对待各种学说都应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系统的批判性分析论证，科学地取舍与发展完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也不应例外。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的态度，也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前进的生命源泉。

真理是永恒的和绝对的，事实上不存在相对真理。所谓相对性是指认识真理的相对性。真理的揭示过程是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地渐进发展的。人类认识真理是个承前启后的历史递进、积累过程。一个原理的揭示，有时要经历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的接力运动，然而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所能认识的事物因人生的局限而十分有限，必须立于前人的认识基点上向纵深探索。

人类认识世界的历史递进性和社会整体性，决定了揭示真理是个承前启后的接力过程，因而真理的揭示是随人类发展而无限延续的。人类揭示真理犹如一条无限的链条，但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人在揭示真理的历史长河中只是其中的某个点或段，个人所能揭示的真理哪怕贡献再大，也只是这个链条中的一节或几节。

认识事物的层次性和渐进性，犹如解数学方程式一样，有时可能列出了方程但不得其解，有时也许只解了第一步而未能解其全部，而有时也许连方程式也未列对。只有当完成方程式的全部解并经验算是正确的，才能宣称完成了终极真理的揭示。虽列出方程式而无解，或只解了一至两步，这只能认为揭示了真理的一至两个层次，这就是揭示真理的层次性或相对性。因此，真理是绝对的，而认识真理是相对的。

人类认识真理是曲折的，有的有所发现，但有的也许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有科学的因素而无科学的系统。这就要求通过还原实践的“逆运算”进行检验。许多科学原理的发现都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有时历经数代人前仆后继也无完整的成果，但历史上的任何探索都是有益的，哪怕是完全错

误的，也不应因其错误而冠以政治偏见加以诋毁。后人的任何成功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前人搭起的历史人梯护送到科学的顶峰摘取桂冠的，因而任何人的成果除了其自身的突出贡献外，也是历史积累与社会积累的共同成果。

人类认识事物都有一个由经验到科学的发展过程。经验认识是根据直观信息即对现象的归纳得出的结论，通常用事实加以证明而得出结果。科学认识则是对事物本身物质结构、运动程序和能量作用关系进行解剖而得出结论。经验本身不是科学，但经验是科学认识的基础，因为经验是一个为科学认识提供信息的过程。经验认识是表面的、低层次的。科学认识才能不断深化，其认识的深度是无止境的。19世纪之前的科研基本上都是经验结论，因而可以说20世纪初之前的大多数科学成果都处在经验发现的层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亦不例外。

将经典理论放在人类认识的历史长河中看，是一个由经验认识到科学认识的重大历史转变阶段。但应该看到这仅仅是转变的伟大开端，而并未完成其彻底转变，因这一历史时期的自然科学并不发达，19世纪自然科学的总和除数学等极少数学科外，基本包含在现代初中课本之中，即使全部掌握也只相当于目前的初中程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自然科学密切相关，因而那个时期要彻底完成由经验到科学的转变是不现实的。

经典理论是一个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学说，是当时一切进步思想的积累总和。尤其是其哲学基本观点（尽管还处于初级），是对人类的突出贡献。其精髓仍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